

邱磊 李达◎著

用生命的母语做教育

——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对比研究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PRESS

邱磊 李达◎著

用生命的母语做教育

——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对比研究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用生命的母语做教育: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对比研究/邱磊,李达著.—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18

ISBN 978-7-5520-2453-1

I. ①用… II. ①邱… ②李… III. ①陶行知(1891—1946)—教育思想—研究②杜威(Dewey, John 1859—1952)—教育思想—研究 IV. ①G40-092.6②G40-097.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02095号

用生命的母语做教育——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对比研究

著 者:邱磊 李达

责任编辑:路晓

封面设计:戚亮轩

出版发行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

电话总机021-63315900 销售热线021-53063735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照 排: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印 刷: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10×1010毫米 1/16开

印 张:9.25

字 数:163千字

版 次: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


ISBN 978-7-5520-2453-1 / G · 776

定价:4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序

邱磊是我忘年交的朋友。其主持的江苏省“十三五”教育科学规划陶行知教育思想专项重点自筹课题“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比较研究”的成果《用生命的母语做教育》一书即将面世，盛情约请为之作序，我欣然应允。

结识邱磊，得感谢王丽琴博士。王博士是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杨启亮教授的高足，博士毕业后在江苏教育学院教育管理系任教。她参加我主持的江苏省“十五”教育科学规划重大课题“江苏省名校校长名教师成长机制与规律的整合研究”的工作，与课程组的其他成员一道开展名校校长名教师的集体性个案研究。在课程研究中，她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之后，她在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任职期间，受张文质先生之邀，在“1+1教育网”注册，成为部分青年教师的导师。先后两年时间，组织全国各地十多位教师共读杜威的著作，分享杜威的教育智慧，共同撰写、出版了《“偷师”杜威——开启教育智慧的12把钥匙》一书。这本书的主编，就是邱磊同志。王丽琴博士热情地向我推荐了他。从此，邱磊加盟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，成为陶行知的追随者，成为一名青年陶友。他不仅和杜威先生结缘，而且和陶行知先生也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他多次参加省陶会的“学陶”“研陶”工作，在活动中脱颖而出——在“行知伴我成长”论坛上演讲、在陶研骨干教师培训班中做专题讲座，得到广大陶友的好评。

学会的生命力在于持续不断地开展学术研究。江苏省陶研会是全国最早成立的陶研组织之一，“学陶”“研陶”工作始终走在全国前列。2017年，在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、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的支持下，陶行知思想和理论的研究正式列为江苏省“十三五”规划专项课题。我们组织、发动广大陶友积极申报。其中，邱磊申报的“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比较研究”被成功批准为江苏省教育科学“十三五”规划专项重点自筹课题。2017年上半年，我们在金沙中学召开了课题论证会，江苏省陶研会、南通市陶研会近十位陶研专家对该课题进行了充分而认真的研讨，给予高度评价，并提出深入发展研究的诸多建议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。

在邱磊及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，搜集了大量研究资料，积极思考与探索，运用资料分析、比较研究等方法，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，完成课题研究任务，达到了课题研究的目标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。值得鼓励，值得庆贺！

邱磊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地理系，先后在南通市通州区二甲中学、金沙中学任教。2012年获得《教师月刊》杂志评选的“年度人物”称号，2016年第1期，杂志又专门发表一组文章，介绍他成长的轨迹与故事。近些年来，他在《人民日报》《中国教育报》《人民教育》《行知研究》等报纸杂志发表文章近10万字。主编《“偷师”杜威》《杜威教育箴言》等著作。把平凡的工作做出不平凡，把简单的事做成不简单。邱磊成长、发展的故事，给予我们诸多启示。我赞同著名特级教师凌宗伟对他的评价：“一个对教育用心、用情、用意的人”，“阅读使他丰富，行动使他清醒，记录催他思考”，“坚持一个思考者的姿态来实施和改善教育”。在当今物质主义、功利主义思潮泛滥的社会，青年教师邱磊始终保持着一一种平和、淡定的心态，不急躁、不浮躁，“不驰于空想，不鹜于虚声”。安心教学，静心读书，潜心思考，虚心求教。生生不息，无懈无怠。这种精神，这种情怀，这种追求，值得提倡，值得宣传和推广。

邱磊回眸成长的轨迹，曾概括了“活出本我”和“跨界发展”两个理念。这说明一个教师的成长，关键是在教育教学的改革实践中自我修炼、自我建构、自我完善。内因是依据，外因是条件。自身努力是成长的根本。活出“本我”，就是最大限度地开发自身的潜能和条件，使之最优化、最大化地发展。教师的成长，跨界发展也是很重要的。当今开放的社会，开放的教育，教师不能固守、拘泥于自身的学科专业，需要跨学科、多学科的发展。需要不断地提升境界，拓宽视野，在开放的多元环境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。跨界发展，需要确立共享发展的理念，最大限度地利用方方面面的社会资源，为我所用，促我发展。向“重要他人”学习，也正体现了一种共享的理念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的李达校长，也为本课题的深入研究，做出了宝贵的贡献。多年来，李校长对“陶研”工作也颇有自己的经验与感悟，在他持续不断地支持、参与和帮助下，邱磊关于陶行知与杜威思想的比较研究，才渐渐有了明晰的方向。当然，在2016年底课题立项之前，邱磊已经有了不少的累积与思考，比如，有资料的收集与整理，也有理性思考的成果，如《论“生活力”的教育思辨——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的追溯和重审》等文章的发表，《杜威教育箴言》的出

版等。但有了李达校长长期的管理、统筹的经验，包括在部分章节上的安排、撰写、修改等，本课题的定位就会更高，视野就能更阔，底气也就更足。

《用生命的母语做教育》一书，正是这样学习、思考、研究、探究的积淀和结晶。没有前期学习和研究的基础，难以有现在的研究成果。本书中，邱磊以“教师研究者”独特的表达方式，对中、西方两位伟大教育家的教育思想进行了认真、细致的比较研究，对其产生的背景、沿革、重要论点、主要贡献进行了阐述。这个过程中，本书既论述了陶行知先生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推崇、传承，又着力论述了陶行知先生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变革、超越、扬弃和发展，其中有诸多亮点将对读者产生启迪作用。例如作者选择“生活力”作为论题，透视生活教育思想与实用主义哲学的关系，分析“生活力的杜威基因”；作者对生活教育的发展过程及理论体系、生活教育的“七个维度”的归纳与概况等，都是潜心研究的成果，有其独到的见解。正如作者自己所总结提炼的，在解读陶行知和杜威教育思想及其发展上，完成了三个统一：第一，空间统一。陶行知思想的美式背景和杜威思想的中式解构，渐融为一体；第二，时间统一。从民国而至当下，对两者思想的认识、评价均趋于理性和客观。无论是历史文献，还是时事摘要，两者思想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读，但围绕核心，互为映照，常读常新；第三，精神统一。在分述两者的思想发展时，均采用“广角镜模式”，即追溯各自学术生命的“上下游”。如：关键影响者、关键事件、关键时间等。但在内核上，作者将之提炼，即寻找“生命的母语”正是教育探索的共同旨归。邱磊在写作范式上，也有自己独具一格的写作语体，以平易、生动、接地气的表达方式，呈现了自己的学术立场、学术研究品位和风格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

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“行百里者半九十”。我衷心祝愿邱磊同志一如既往、坚定不移地走行知之路，走“学陶”“研陶”之路，努力做一名高素质、专业化、创新型的卓越教师！

江苏第二师范学院二级教授
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

王铁军

目 录



Contents

序 1

第一辑 一个时代的教育逻辑与信仰..... 1

- 引子 3
- 陶行知经历过些什么? 7
- “生活力”的价值回归 14
- 一点一点,陶氏思想的稀罕处 21

第二辑 “天字第一号”的革命 25

- 谁是杜威? 27
- 体制的逆行者 31
- “杜威时代”的刻印 45

第三辑 关键理念:生长的本质..... 57

- 教育即生长 59
- 培植生活力 75

目录



Contents

第四辑 两个体系的对话..... 83

两条路，一条心 85

对话·辨义·真相 99

第五辑 寻找生命的母语..... 10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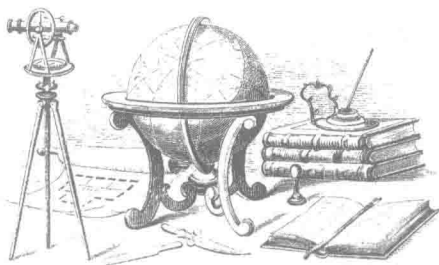
汲水：回到教育的源头 111

教育观察：从思维到态度 125

后 记 137

第一辑

一个时代的教育逻辑与信仰



陶行知的教育思想，与他的老师杜威渊源颇深，其在我国近百年的教育历史中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，至今还在滋养后人。我们从陶行知个人的成长过程中，既可以初窥其理论概貌，又可以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，从而引起对当今教育的思考。



引 子

陶行知，作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一位享誉海内、世界著名的大教育家，其理论与实践，足足影响了几代人，乃至焕一时之新颜，成一派之新学，立一世之新风。他一生笃信“行知合一”，其“行”“知”，包括“意”“情”等，多在中华大地上化生、演绎和成熟，可算作现代教育史上无法绕过的重要人物。

杜威，20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，实用主义的先行者，一生贯通哲学、心理学、教育学。曾任美国哲学学会会长、美国心理学会会长，创办芝加哥实验学校，建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等。这样一位世界级的“大咖”，似乎命中注定，跨越了半个地球的距离，成了陶先生的老师。其教育哲学观及基本的理论结构，对陶先生的教育人生，影响深远。

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里，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一对师徒？或许有一点是关键，那就是他们对战胜现实生态下的藩篱、枷锁有所帮助。目前，我们的教育具有同质化的生态结构。具体一点说，就是祖国虽辽阔万里，但是无论走到哪里看，学校、课堂都渐渐趋同。这种趋同性带来的弊端很多，比如说：单维的校园生活（乏味而逼仄的日常生活）、线性的评价机制（几乎以分数为唯一标准）、催生的成长环境（三年的教学内容两年完成）等。

毫无疑问，这与孩子们“多维”的生长需求、“立体”的价值诉求和师生间教学相长的“共生”关系是直接冲突的。举例来说，这种冲突性在中美对教师的要求上是完全不同的。中国教师主要有四种能力：本体性知识（专业知识）、实践性知识（操作知识）、条件性知识（教育学、心理



学)和文化知识(通识)。其中,以专业知识为核心。而在美国,教师的技能要求则多得多,也开放得多,至少表现在十个方向上:教学理念与设计、学习的基本原理、班级组织管理、基本背景(教学的社会背景、政治背景、文化背景)、教育评价、学科知识、阅读和写作、人际沟通和协作合作、法律常识、教学道德与伦理。

这个时候,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陶行知先生,他在1931年8月发表的《教学做合一之教科书》一文中明确提出教师应有70项“生活力”,我们简单罗列其中的部分:“防备霍乱、防备伤寒、防备天花、防备感冒、打篮球、踢球……种麦、种树、养蚕、纺纱、织布、扫地、换新鲜空气、用水风车、制造抽气唧筒、制造气压表、用氮气做肥料、用空气压力钻钢、用太阳光烧饭、用太阳光杀菌……”这其中的许多种,可能是当下的我们从未听说过的。

陶先生一生坚持“教学做合一”,并且在场景化、实操化的“做”的过程嵌入了不同的学科知识与技能,在对学生的评价中,强调“小先生制”——也让他们在“教师”的角色上,把知识讲清楚、做到位、学到家。他在对老师的要求中,主张“每日四问”:问健康、问学问、问工作、问道德,究其核心,就是做一个具有“生活力”的人。从这个角度说,每一个对教育怀有热忱和改革动力的人,都会深感到当下的冲突和逼仄的环境。

杜威的路数,与陶行知偏于实践的情形,并非相同。比方说,心理学,或者说教育心理学,是杜威一直引以为豪并格外重视的科学支撑。在他眼里,传统的工业逻辑下培训技术劳动力的灌输方式,已经严重背离了教育的本身。他要做的,是正本清源,是将“人”作为主体,重新确立到实用主义价值观下的教育立场中去。这个“人”的观念,在杜威的教育信条中,就是“经验”,他一生坚持教育是“经验的改造”,不研究儿童的心理,不了解他们的需要,不在乎他们的兴趣,是不足以谈教育的。他在书中说:“教育学最重要的问题是:如果没有儿童现有的、未加工的、本能的经验,成人意识中完整的和系统的知识如何能逐渐地发挥作用。”

如果能从心理学出发,就至少可以看出两点:一是儿童的世界具有整体性,而不会被各种学科分割得支离破碎;二是儿童的知识组成天然地表现为非结构化、非系统化,也不是科学的,他们只能以自己的认知能力为基础,凭着兴趣、经验、愿望,在个人身处的环境中感知世界、描绘世界,并与世界交互。

杜威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说,小学的最初阶段,大多数学校会教儿童



如何在划好的格子内正确地写字（在我国，“田字格”可是很多人童年记忆的一部分），要求横平竖直，字字规范，行行齐整，但研究表明此时他们的肌肉、神经、眼睛、双手都没有成熟到足够用笔进行如此精确而细致的训练。“不夸张地说，钢笔比剑难以驯服。”真正的训练应该是怎样的？是利用生活中所见的广告牌、楼宇的名称、街道上的路标等一切能出现汉字的地方，在潜移默化的濡染中让孩子认字、写字和用字。这一思想，就是杜威说的“学校即社会”。

显然，不管是课堂，还是教材，杜威一直摒弃机械施行的统一模式，而是以提供环境，让学生自己在“雏形的社会”中感受、领悟、生长为教育信条。“心理化”成为其不停奔走呼吁的一个关键词。

杜威的思想，在中华大地得到广泛宣传与认同后，1922年以“儿童为中心”的“六三三”学制（小学六年、初中三年、高中三年）就开始施行至今。其后，“教育视导”等西式制度亦开始推广。这些制度之下，与陶行知同时代的蒋梦麟先生认为，教育培养出的人，须有三种特征：一曰“活泼泼”，二曰“改良社会”，三曰“能生产”。类似的说法，1920年陈独秀也在武昌表达过。“活泼泼”，指向人的灵性和多样性（成长、性格、兴趣、禀赋等），建构了教育的多元生态；“改良社会”，指向人的使命和价值取向，奠定了教育的伦理基石；“能生产”，指向人的实践力和创造性（言论、思想、行动等），确立了教育的应用哲学。

这三个特征，对世人评判教育多有助益，其所映射的正是当下教育的板结化、教条化和盲目的“效率崇拜”（雷蒙德·E·卡拉汉）。我们的短视和浅薄，尤其是工业化逻辑下的凡事讲究“精确”“控制”“标准”“量产”“复制”……正不断葬送孩子的未来和前途，教育也被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。民国灿若星海的教育大师们，如同一个个大写的“人”字，其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“教材”，他们主张打通社会与学校的壁垒，推行平民教育，甚至建议学生读点“无用的东西”。这些不甘坐而论道的教育先哲们，俱有一种“实验”的精神，研究脑科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，在“发现—设疑—假说—验证”的实证主义道路上，扎扎实实地“做”教育——让每一个接受知识的人都到乡村、田间、街道等广阔的天地中接受锤炼。

这些先生都很耿直，甚至可爱，而可爱中透着执着，执着中带着大智大勇的，陶行知可以算是典型的一个。他坚持认为教育要想达成对“人”的回归和成全；坚持以教育作为开启民智、救国救难、自立自强的实践路径；最为重要的，还是要唤醒每个人的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。这些执着的努力，一直被杜威看在眼里，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。1928年，他从苏



联考察回国后，曾高度评价陶行知说：“陶行知是我的学生，但比我高过千倍。”1936年，我国发生了“救国会七君子事件”后，他应陶行知的请求，联名爱因斯坦、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，致电蒋介石，敦促蒋本着保障基本人权的精神释放“七君子”；1937年，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，杜威又回应陶行知的请求，联名呼吁许多国家的政府元首和学术名人，号召抵制日货，谴责和阻止日本的侵略战争。乃至到1946年陶行知逝世后，美国教育界举行陶行知追悼会，杜威任名誉主席，并发表演讲，肯定了一生为践行教育理想而奔波劳碌、教化育人的陶行知。

在那个时代，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成了治身、治教、治学的价值共识，也成了后人评论“他们的背影，一个民族的正面”的关键注脚。正如傅斯年所强调的“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，是办不好的”那样，教育的底气和风骨，来自坚定的去行政化、去犬儒化和去媚俗化。这之中的“自治”精神，在民国时代尤为凸显，从学校自治、教授自治，到学生自治等，这一点对呼唤“教育家办学”的当下来说，对学校的学术委员会、教代会、学生会的作用提升来说，仍极具启示意义。若是说追求人之个性、能力、知识等，尚属“术器”之论，那发蒙乃至坚守人之独立、自由的精神和信仰，则是“道法”之学，更需我们教育者去谆谆善导。

“仰观绝顶上，犹有白云在。”百年中国，百年教育，百年先生。今天我们重新审视20世纪的陶先生，对比其与杜威先生的思想渊源、疏同，于流变、分异、再构……无数次的碰撞和反思中，去梳理那个时代的教育探索和践行之路，既感受实用主义的温度与力量，体验“生活教育”理论的诞生、发展与成熟，去见证我国教育在内忧外患中的求索和改革之路，以及在与中西方教育哲学、教育思想的激烈碰撞中完成的本土化解构和价值回归。

下面就开始这场思想之旅吧！



陶行知经历过些什么？



启蒙·学之短长

“人，就是目的。”哲学家康德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或许并没有意识到，这简简单单的五个字竟是一个时代的教育注脚。但这个时代，却不在当下——我们见惯了“航母学校”，见惯了“集团办学”，见惯了“数字化生存”（分数），也见惯了流水线下的“模式拷贝”，却独独见不到一个个脸孔清晰、性格分明的“人”。这个真正需要我们回望的时代，是民国。

陶行知生于1891年10月，比杜威小了32岁，而这一年年底，他未来的重要搭档，也是他的师兄，胡适降生了。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人民教育家，同时又是坚定的民主战士和大众诗人。当然，民主也好，诗歌也罢，与他的教育事业，本就一体，成就了独具风格的陶式教育路线。

有人研究历代的著名教育家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凡有大成就者，都处身在一个革命的年代中，如发明“竹简”后的孔子、老子，产生“草纸”后的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出现“活字印刷”后的朱熹等。而陶行知，也正适逢时代的变革、转型期，只是这一次大变革不是简单的技术革命，而是将整个国家、民族都推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——所谓的“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，如疾风骤雨，自然比任何单纯技术性的突破都更有颠覆性。

陶行知祖籍浙江绍兴，出身于安徽歙县一个贫寒人家。虽说家境不好，但或许是命运的眷顾，四五岁时，早慧的他就能把邻居家门前的对联，照猫画虎地描在屋前的泥地上，有次被邻村方庶咸秀才看见，惊叹不已。6岁时，小行知经常偷偷到方秀才开的私塾外驻足“蹭课”，方秀才



试了他几次，发现果然聪慧异常，心中越来越喜欢这个小家伙，于是干脆免费为他开蒙，入蒙童馆就读。

17岁时，他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，本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，却因受教会歧视，愤而退学；随后考入南京汇文书院，次年又转入金陵大学文科。在内忧外患的逼仄下，危厄之局让他对教育有了坚实而迫切的思想基础：“人民贫，非教育莫之高之；人民愚，非教育莫之智之；党见，非教育不除；精忠，非教育不出；教育良，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，真领袖不期出而出，而多数之横暴，亦消于无形”¹。当时，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抱有“救亡图存”的思想，只是方式各不相同，如“实业救国”的张謇，“科学救国”的任鸿隽，“笔杆子救国”的鲁迅，等等。

但不少人经历种种挫折后终才清醒：相比于坚船利炮，唯有教育才是开启民智、自强自立、抵御外辱之道。从这一点，可以看出陶行知经过冷静思考和树立鸿鹄之志后，终身选择“教育”的历史必然性。

在此期间，受辛亥革命影响，陶行知在校积极参加爱国活动，主编《金陵光》学报，宣传民族、民主革命思想。毕业后，他赴美留学，曾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研读，并师从杜威、孟禄、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。

遇到被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称为“美国天字第一号思想家”的杜威后，陶行知信服于“教育即生活”理论，尤其是“五四”期间杜威来华，在国内产生巨大的影响，其对传统教育的猛烈批判和实用主义的冲击，给僵化陈旧、沉疴难起的旧教育带来了新血液、新力量和新希望。作为思想家的杜威，他的教育理论最为人熟知，也最有影响力的是“教育即生活”“学校即社会”和“从做中学”这三句话。它们的核心就在于通过“生活”（即学校生活和社会化生活）与“做”（即实用主义、实验主义的操作论），实现“成长”的目的。这一方面和陶行知早期的崇拜者——明代大儒王阳明的“行”在哲学意义上不期而遇，另一方面又大大拓展了教育实践的可能，将传统教育的受益面一下子从“点”拓展成“面”，从“单维”的身心修为，延伸至“多维”的社会化、网络化的整体训练。

陶行知受此启示，大为兴奋地说：“我们必须有从自己经验里发生出来的知识作根，然后别人的相类的经验才能接得上去。倘使自己对于某事毫无经验，我们绝不能了解或运用别人关于此事之经验。”²这显然是受到

1 陶行知. 陶行知全集（第一卷）[M]. 长沙：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84：51.

2 陶行知. 陶行知文集[M]. 南京：江苏人民出版社，1981：226—227.



杜威“经验改造论”的影响。因为生活是无处不在的，每个人的“生活力”也各有不同。“春色无高下，花枝自短长。”只要将生活融入教育本身，调动和改造每个人的经验，则每个人必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长之道。从此，他的“生活教育”理论，开始慢慢成形。

1917年秋回国后，他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、国立东南大学任职，并由此开始了富于传奇和艰辛的教育生涯。他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，提出了“生活即教育”“社会即学校”“教学做合一”等教育理论。他特别重视农村的教育，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，发动并指导了平民教育、乡村教育、国难教育、抗战教育等。在幼儿教育、儿童教育、师范教育、女子教育、义务教育和中高等教育方面大力改革；创办晓庄乡村师范、育才学校和中华教育改进社、生活教育社等改革社团，在持续不断地探索实践和改良中，创立生活教育理论体系，足足引导了一个时代的教育逻辑和潮流。



启业·形之上下

陶行知为后人留下最宝贵的财富，是生活教育的理论。从1922年陶行知发表《生活教育》正式提出“生活教育”的基本概念以来，时间已过去近一个世纪。如今放眼世界，欧、美、日、韩等各国（地区）对“生活教育”的研究多有建树，国内的研究和实践更是不断取得新绩和突破。我们发现，自民国以降，教育家灿若星辰，唯独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及实践，非但未被湮灭，相反，正越发显现生机，在城市、乡村的广袤大地上茁壮成长。我们在惊叹于这一奇迹的同时，首先要问的便是：“生活教育”到底从何而来，她又缘何能超越时空，具有如此历久弥新的魅力？

其实，这既和杜威的影响有关，又是时局下的无奈之举。可以说，生活教育是陶行知平民教育、乡村教育、战时教育、创造力教育等思想的“最大公约数”，是其思想核心。很多人似乎特别推崇这一思想核心，但又被陶行知先生的种种客观表现（演讲、办刊物、办学校、办团体等）所束缚，不能抽丝剥茧地看出其本质是方法论，是一种教育哲学。这套教育哲学从根源上论，来自两方面：一是直接来源，即自己师父的实用主义哲学在教育上的投射。他提出的“教育即生活”“学校即社会”“从做中学”，陶行知后经改造而成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的三驾马车：“生活即教育”“社会